

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条件和作用机理

任映红^a, 王勇^b

(温州大学 a. 马克思主义学院; b. 政法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我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毁坏了农村传统村落的原生态,引起一系列社会变迁,导致农村社会的重大失衡。村落共同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适应、演变、转型等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重大问题。村落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按照其内在逻辑以隐性的方式缓慢地延续着。村落变迁自有一定的背景和条件,这就需要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不同层面来考察。研究村落变迁的发生因素和作用机理,把握村落变迁的形态和村落终结的过程,将有助于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关键词:城市化;村落变迁;条件;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5)01-0136-05

DOI:10.16354/j.cnki.23-1013/d.2015.01.031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毁坏了农村传统村落的原生态,引起一系列社会变迁,导致农村社会的重大失衡。村落共同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适应、演变、转型、消亡等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重大问题。据统计:“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总数锐减为271万个,十年时间内锐减90万个自然村。”^[1]传统村落因各种人为或自然的原因,或被扩张的城市所吞噬,或因政绩工程被拆得七零八落,或因过度开发变得面目全非,或因年久失修轰然坍塌,或因村民大量进城务工变成“空心村”。传统村落文化的内在结构面临支离破碎的危险,全国各地许多承载着传统文化遗产的村落,已成为永远的文化遗憾^[2]。这些在中国速度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终结”,经媒体传播,不免让人深深担忧。不管我们对传统村落还有多少留恋和念想,村落的减少或消亡、改造或升级已不可避免。笔者认为:村落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按照其内在逻辑以其隐性的方式缓慢地延续着。村落变迁自有一定的背景和条件,这就需要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不同层面来考察。研究村落变迁的发生因素和作用机理,把握村落变迁的形态和村落终结的过程,将有助于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一、村落变迁的自然环境因素

我国村落数量大、分布广、规模大小不一,既有

仅个别住户的孤村(如在山区),也有数百人口的大村(如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整体来看,村落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一般主要由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的人口居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变,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基本单元的村落,在自然资源的约束下也发生着或渐进或快速的变迁。拥有不同自然资源的村落发展成为不同的形态: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村落被逐渐开发成为旅游村落,发展休闲旅游和特色旅游;有些生活环境相对较差的村落,进行村落的现代化改造,也更适宜村民的居住和村落的发展。在改造或发展过程中,村落的变化或大或小,其变迁具有政府推动型和市场引导等特征。

(一) 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的影响

乡村旅游和游客的需求影响着旅游的发展,而地方政府和村落居民为迎合游客的旅游需求,基于生活或发展需求,调整自己的历史文化或村落文化的形态,改变村落的历史建筑物或村落的传统文化,进而带来村落的形态变迁,或渐变,或突变,或恢复,或重建。

传统村落(又称“古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3]。传统村落进入当代,命运多舛。要不就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实际就是开发一个破坏一个;要不就是根本不遵从文化

收稿日期:2014-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变迁的特征概括与规律分析研究”(12ASH003)、浙江省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映红(1965—),女,浙江东阳人,院长,教授,从事文化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王勇(1975—),男,江苏淮安人,副教授,博士,从事行政管理学研究。

规律,只从眼前的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4]。传统村落的保护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共646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出台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2013年共915个村落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5]。截至目前三部已命名了两批共1561个中国传统村落。然而保护传统村落决不是对其原封不动。一些具有旅游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村落,通过适度、有规划的发展旅游业,可以实现村落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并可以提高居民对于家园经济价值的认识与保护意识。有鉴于此,就可以为保护古村落提供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

当前,以村落为载体的乡村旅游发展快速。乡村旅游立足于农村和农业,以满足游客的观光、体验、休闲、度假等需求,是紧密连接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形态。旅游作为外部因素成为影响传统村落形态变迁的重要动力,影响着村落的总体布局、街巷结构、集贸市场、标志物、村落边界、建筑外型等村落物质形态。随着乡村旅游和游客需求的发展,基于旅游发展需要和乡村传统资源保护的均衡,村落在建筑物、道路、村落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着变迁,其变迁的诱因来源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人口变化和村民收入变化的影响。

(二) 重大工程催生大量移民村

因国家战略需要和灾害地区重建需要,国家会做出许多重大决策性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汶川地震重建工程等),这些决策具有国家政治性特征。目前,国家重大决策性工程是某些村落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受重大工程影响的村落,在政治决策、地理位置、村落自身因素和外在文化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导致村落的搬迁。并在政府的引导下出现整体性的村落再造和重建,进而导致村落的建筑、历史、文化和村民价值观等都呈现现代化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修建水库达8.6万座,库区移民将近2000万人,如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就引发了百万大移民”^[6]。大型水利水电、生态工程建设会带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产生大量的非自愿性移民,催生大量的移民村。如三峡库区人口结构性迁移就是可载入史册的典型案例。三峡大坝会形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库淹没区——三峡库区,处于淹没区的城镇和村落必须按预定方案进行迁移,在迁移过程中许多村落都消失了,随着村落的淹没,村落负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一样被淹没了。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再如南水北调工程作为当前我国水利重点建设工程,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但也产生数量巨大的非自愿性移民。

村落变迁条件有内源性和外生性的。内源性是指主要由社会内部因素引起,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乡

村社会内部,是渐进的、主动的过程。外源性是指主要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由外在因素的冲击而引起的一种被动变迁。移民村落变迁属于典型的外源性变迁,表现为国家重大工程政治决策影响下的村落的被动性和规划性的变迁,是政治的力量直接干预村落发展的产物。

在移民村落变迁中起主导作用的政府,重在避免村落终结后带来的各类潜在风险:要统筹考虑移民的经济补偿和心理需求,建立相应的纠纷协调管理机制,让移民有表达利益的渠道,有参与权、知情权、话语权;在制定政策时要重视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损失;要重视村落文化重构,加快社区融入,增进移民在新村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 环境污染造成“寂静的春天”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首次关注环境问题,并以惊世骇俗的语言展现了农药对人类环境的危害,强烈震撼着陶醉在工业文明中的世界各国的神经。污染问题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它不仅不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村落的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如工业企业排放废水毒气、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生活垃圾和水污染等。

近年来我国“癌症村”研究报告的披露则是中国村落“寂静的春天”的再现。据媒体和专家分析:“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该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大陆的27个省份。”^[7]大量的生产企业(特别是小作坊)如果没有相应的环保措施或处理得不完善,在其周围生活的人群也可能被暴露在职业风险中,生产的垃圾在污染周围环境(水、土壤、空气)后进一步增加周围人群罹患癌症的风险。污染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隐患,职业病高发,生命健康受到挑战。

环境污染对村落变迁的影响极大。“癌症村”的大量出现是村落笼罩在污染中的最突出的表现。作为受污染损害的村落,其变迁的直接诱因来源于村落生产和生活功能的退化,村落里的村民身体、动物和植物受到严重的安全危险。拥有不同财富资源的村民选择不同的方式应对“癌症村”的威胁;条件好或有技术特长的村民选择离开受污染的村落,到更适应生活或生产的地方开始自己的生活;而条件不好的或特长不明显的村民则选择留在村落,或向政府寻求帮助,或者等待死亡。但这种条件下村落变迁的形态,最终将表现为村落的空心化或村落的消解。

二、村落变迁的政治经济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层面的系列改革大力推进。“思想解放与观念变革类似于Ideas(观念、主意、知识、经验、创新等)增长模型。这是一个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的投入,是无形要素投入或软投入,区别于资本、劳动、资源

等有形要素投入或硬投入”^[8]。如联产承包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创富欲望,整个农村社会翻天覆地地变化着。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2004年至2014年的十年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聚焦“三农”问题,这些都为村落变迁提供了宏观政策环境。

(一) 城镇化对村落的挤压

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确立的“城镇化新政”,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传递城乡平等理念,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拉动内需的新动力,其一系列改革和制度变迁,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红利。但是,“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9],传统村落的退守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结果。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曾经的农业大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农村城镇化必然带来许多村落的终结。“城镇化过程实施的征地拆迁和撤村并点行为,所向披靡,它直接导致村落消失,是近10年村落急速消亡的最主要缘由”^[10]。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能够广泛吸纳村落的资金、土地(城镇建设用地扩展)、劳动力等资源。在政府有意识地规划引导下,村落发展为社区化改造,历经或兼并重组,或自然死亡等形态变迁。

城镇化带来生产、文化或消费、政治和生活的日益集中,其推动力和吸纳力攫取周边村落资源,或直接辐射周边的村落,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带动村落的变迁,进而出现“城市过密”和“农村过疏”的问题。“过密化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空间的急剧扩张而出现的人口、资源高度集中的现象;过疏化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因为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导致村落人口大量减少、资源大量流出的现象”^[11]。“过疏化”的直接表现即为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发展趋势和村落发展活力的丧失,导致村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据统计,2012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63亿人,并且每年以近千万人的速度增长^[12]。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在中国农村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庞大留守群体。

城镇化过程中还伴随着村落社区化。中心城镇的迅速膨胀并向外扩张,使得城中村或城郊村往往被纳入社区化管理而走向村落的终结。“原来以农业为主题、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世界逐步发展成为兼有城乡经济结构、城乡建设设施和城乡生活方式并存互动的格局,最终演变为新兴的城市地区”^[13]。城中村或城市边缘地带的村落终结,不意味着农民的终结和农民的市民化的完成,城镇化或农村社区化的过程关键是“人”的城镇化或市民化,而不是物理上的城市化或空间上的社区化这样简单的转化。

(二) 非农产业持续的带动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村落不断被卷入中国市场的大环境,村落因拥有资源或受城镇辐射的影响不同,部分村落摆脱传统的农业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逐渐发展为专业村或城镇产业化加工基地等非农业产业化道路,进而带动村落经济结构、经济基础设施、村落交往世界或家庭关系等的变化;部分村落表现为较强的组织化发展,如建立专业合作社等,这种变化表现为村落主动性的变迁。

传统的许多村落以农业经济为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村落逐渐被卷入市场发展的大潮中,拥有不同资源的村落在保持原有部分农业经济的同时,逐渐在资源或技术优势的条件上发展自己的非农业特色,走非农业产业化发展专业村道路。专业村是指“农村大部分农户商品性的从事一种或多种相互关联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并且该产值构成这个村的社会产值的主体”^[14],专业村作为中国农区空间经济中的“马赛克”,正受到学者们的关注^[15]。

在非农化过程中,农民的经营内容和思维模式也呈现非农化转变,形成了许多非农专业户。非农业产业化改变着村落的面貌,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的局面,出现了养猪专业户、苗木专业户、来料加工户等非农业经济户,家庭的经济收入迅速提高。随着非农业化的发展,村民经济条件大为改观,使得通过村民集资改造旧村面貌的规划成为可能。

(三) 政府规划下的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所开展的村落改造运动。我国是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村落变迁具有很强的政府社会规划工程推动的特性,有较强的政治动员的特征。总体看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由以行政为主导推动力的、“自上而下”的村落改造建设运动,即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以村落合并等形式推动村落快速实现变革。

结合浙江、江苏、海南、成都、重庆、山东等地的做法,村落改造主要有四种模式:(1)通过村庄合并、“农民上楼”等方式推进人口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2)变革居住方式。在人口集中的基础上建造农民新村,农民告别传统居住方式,住进现代楼房,实现居住方式变革。同时,也使农民日常生活成本提高,传统村落社群关系和村落文化也有消亡的可能性。(3)组织村落重建,即撤销辖区内全部行政村的建制,合并形成新的农村社区,并逐步选举产生社区党委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让农村社区成为农村新的社会基层组织单元。(4)推进城乡政策一体化。即通过户籍改革,城乡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市场体制、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等政策体系的变革,实现城乡管理政策和体制一体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政府大规模推动村落改造的国家层面的规划,不同的地方政府形成不同的

改造模式,不论模式是并存居住、集中“上楼”、组织重建还是城乡一体化,其共同的特征都在于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进行干预。通过政府出台政策、注入资金和引入企业等方式,或部分或全部地改造村落的外在建筑、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有计划地引导村落的变迁。在此过程中,村落形态或渐进、或突然地发生变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下发生的乡村快速变革,会因共同体的瞬间终结而使农民长期积淀的社会资本急剧缩减。

三、村落变迁的人文社会因素

农民工直接推动着村落日常生活的发展变迁。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无疑对农村社会注入了新的结构性因素。农业技术是社会体系中独立存在的知识系统,是推动村落变迁的重要力量。

(一) 传统农民工对村落变迁的推进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极大的吸纳力将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城镇的市场经济各部门。巨量的传统农民工经历城市文化、工作、生活和消费等方式的洗礼,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其生活过的村落,引起村落里村民个体层面、村落结构层面和村落现代化层面三个方面的变化,导致村落主体分化,引发村民行为方式、村落家庭结构、村落权利结构、现代性文化和传统现代交融的变化,进而使得村落各个方面发生变迁,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更便利生产生活的需要。

村落中的村民主体可以划分为在村村民(留守村民)、务工村民和不在村村民三种主体。三种村民对村落发展产生的作用不同。其中,务工村民对村落的变迁影响是明显的,他们或直接作用于家庭,或间接作用于村落,通过自己的务工所得和城市体验,促使了村民的全面变化;在村村民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直接受影响者,农民工也是通过他们间接地作用于村落日常生活世界;不在村村民成为外出务工农民工的重要社会资本,但他们并没有影响到村落日常生活世界,由于他们长期脱离村落场域的生活,只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与村落建立了媒介关系网络,因此他们无法直接作用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农民工是直接推动村落日常生活发展变迁的核心力量,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互补,同时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差异。

(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梦

当前,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①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新生代农具有文化基础较好、思维较开放的优势,通过打工开阔了视野、积累了资本和技术。而一

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积累一定的技术、管理和资金后,开始返乡创业,开创自己的新生活,成为依靠知识和技术改变村落面貌的重要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文化水平、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社会流动空间小,社会阶层凝固化趋势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一大障碍。由于知识机会不平等、经济机会不平等、户籍制度不平等、文化上的圈子社会都使得许多本想通过进城改变命运的青年农民变成了农民工,只能从事相对底层的工作。”^[16]经历过城市生活和工作体验的农民工,在积累了相应的技术、资金、市场和管理等知识技能之后,往往返乡通过移植或复制创办自己的事业。此外,某些政府也积极支持和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在此过程中,返乡农民工通过创业活动和精英化发展,影响着村落交往结构和权利结构。其中,原来的“差序格局”受到挑战,交往的边界不仅仅局限于地理上的边界,更借助现代媒体和网络超越了地理的区隔。同时,村民对村落权利也更积极地争取,权利内卷化和权利的热情增强。村落的结构发生多方面的潜移默化的变迁,村落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呈现出“村落终结”和“农民终结”的可能性。

返乡创业是农民工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来移植城市文明所蕴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无疑将对农村社会注入新的结构性因素,也必将对村落社会变迁产生重大影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社交中心普遍出现外移现象,已经超出农村“熟人社会”的范围,促使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并且他们主动参与村落权利的建构过程,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热情和对现代民主观念的践行。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村落变迁的媒介和农村文明发展的推手,既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民的分化,也是实现农民自身终结与村落终结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契机。

(三) 农业技术加速村落变迁

农业技术是社会体系中独立存在的知识系统,是推动村落变迁的重要力量。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提到的杂交玉米的变革、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蚕丝业的发展都属于技术引进对村落变迁的影响。

社会变迁根据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内发变迁是指社会变迁的原动力源于社会系统自身,是内部的一种自然生长过程^[17]。关联变迁则是社会系统之外的新思想被传送进来引起的变迁,又分为选择和指导两种影响方式。前者是当社会系统内的成员受到外界影响,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或拒绝新思想引起的变迁。后者是当社会系统外部,诸如一些机构或机构的代理人,为了达到自己的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并且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特指的是新生代外出农民工。1980年以前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称为“传统农民工”。

目的有意识地介绍新的思想所引起的变迁^[18]。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技术逐步进入村落,对个体、家庭和村落三个层面都产生影响,其影响具有交互和传递的特点。其中,个体层面的影响表现为农民的身份和价值观变化,家庭层面的影响表现为家庭劳动分工和家庭权力分配变化,而村落层面表现为村落经济结构和村落社会交往的变化。其中,个体、家庭和村落发生交互影响,最后导致村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

四、结论与讨论

村落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步入21世纪,中国社会加快了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在现代化和市场化发展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沿袭千年的村落社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和我国学者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在我国现代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不断上演,“都市过密”和“农村过疏”的城乡关系演替也是城镇化发展过程的后果。传统的村落或被城市吸纳,或远离城市空心化,或焕发新的生机。当代中国村落的命运是“要么重生,要么消亡”。不论村落的命运最终走向何方,掌握村落变迁的条件因素,有利于前瞻和把握村落的命运的最终走向。

村落变迁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过程,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社会现象。村落变迁作为整个社会变迁的缩影,其发生也非单一宏观层次能够概括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和互构才能完成。村落变迁的发生条件,在不同地区不同村落其主导性条件不同,或为自然环境因素,或为政治经济因素,或为人为社会因素;既有内在动因——农民向往美好城市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有外在动因——城镇化、工业化、商贸发展或旅游开发等。

自然环境是村落变迁的基础性条件。随着城镇化、现代化和市场化逐步进入村落,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的村落变迁差别既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一般而言,自然资源丰厚或生存条件较好的村落,村落变迁更多表现为发展和再生,为正向的变迁;而自然资源贫瘠或生存条件恶劣的村落,村落变迁更多表现为村落消失或空心化,为负向的变迁。同时,村落变迁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和自然资源保护问题逐步凸显,需要政府和学者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村落变迁的政治经济因素方面,城镇化、市场化是中国村落变迁的宏观政治经济背景。城镇化和市场化都是村落变迁的主导性条件因素,“都市过密”和“农村过疏”现象将长期伴随城乡关系,城镇化和市场化影响村落发展的方方面面,不可避免地带来“村落终结”,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将发生从内到外的变化。在村落变迁的人文社会因素方面,经过融合人文和技术的城市生活体验的传统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村落变迁的主体,被打上了城市的烙印和痕迹。将城市的观念、管理、资金和技术带入村落,在直接或间

接的推动下,村落主体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交往方式和权利结构都发生不同变化。同时,经过个体—家庭—村落的传递作用,推动村落从内到外的变迁。

总之,村落变迁的发生条件,在不同地区不同村落其主导性条件不同,但各因素不是单一的产生作用,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村落变迁。

参考文献:

- [1] 张国. 推进城镇化建设应注重古村落保护 [N]. 中国青年报, 2013-03-19.
- [2] 方莉, 胡彬彬. 传统村落急剧消失意味着什么? [N]. 光明日报, 2014-01-10.
-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 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 [Z]. 建村 [2012] 184 号.
- [4] 温家宝同冯骥才对话古村落保护, 称存在强拆问题 [EB/OL]. http://china.cnr.cn/gdgg/201109/t20110906_508466159.shtml.
- [5] 915 个村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名单 [EB/OL].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05/5249331.shtml>.
- [6] 刘荣霞. 河南淅川县库区移民问题调查与成因分析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5).
- [7] 中国癌症村地图 [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55803.htm>.
- [8] 胡鞍钢. 政治因素是中国最重要的成功经验 [N]. 北京日报, 2008-04-07.
- [9]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 [J].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254.
- [10] 冯骥才.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类文化遗产 [EB/OL]. <http://www.npopss-cn.gov.cn/n/2012/1207/c219470-19821903.html>, 2013-04-20.
- [11] 田毅鹏, 韩丹. 城市化与“村落终结”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52(2): 11-17.
- [12] 梁薇薇. 种粮难赚钱 农村“空心化”粮食安全怎保障? [N]. 中国产经新闻报, 2013-05-23.
- [13] 李培林. 巨变: 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1).
- [14] 李小建, 罗庆, 樊新生. 农区专业村的形成与演化机理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09 (2).
- [15] 郑风田, 程郁. 创业家与我国农村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进机理——基于云南斗南花卉个案的实证分析 [J]. 中国软科学, 2006 (1).
- [16] 任映红. 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多重阻滞和推进路径 [J]. 浙江学刊, 2013 (3).
- [17] 杨建华主编. 经验中国: 以浙江七村为个案 [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45-87.
- [18] 埃弗里特·M·罗吉斯, 拉伯尔·J·伯德格. 乡村社会变迁 [M]. 王晓毅,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16-309.

(责任编辑: 王华薇)